

自序

南洋，这两个字意义非比寻常。它让我想到闽粤潮汕地区老一辈华人口里的“下南洋”，也让我记起日本电影《望乡》里的“南洋姐”，当然，它还有别的联想，譬如：南洋画派、《南洋商报》、南洋大学等等。这两个字，沉重、心酸、坚韧、奋斗，但也充满了蕉风椰雨的诗意和娘惹峇峇的富丽。

今年，我移居新加坡整整二十年，入籍也十三年了。整理整理，写的有关新马的散文居然有六七十篇之多，从中选出四十篇辑为一册，名为《在南洋》出版。南洋的地理范畴当然不止新马两国，取其为名，与“南洋”二字包涵的深意有关；并且，南洋二字，也有美学上、文化上的深雅；更有殖民与反殖民的深重。南洋二字，顺带还会引发峇迪、胡姬花、热带雨林、甘榜精神、榴槿、叻沙、肉骨茶、毛姆（W. Somerset Maugham）、孙

中山、陈嘉庚、郁达夫、徐悲鸿、莱佛士酒店、牛车水这些关键词的联想。

南洋前加个“在”字，意味着我是第一代新移民，与南洋的关系没有家族上的连续性。在，是一种当下感，也有一种孤悬感和飘零感。李义山诗句“春日在天涯”里的“在”，可以作为参照。由于我个人的单身，没有第二代帮我扎根，这种“孤悬感”就更强烈了。

身份认同，是一个学术概念，更是现实中一个又一个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具体问题，衣食住行都会碰到。我在二十年前完成了从中国大陆到狮城的地理跨越，随着一天天、一年年移民生活的深入和之后的国籍转换，也在不断完成文化跨越，甚至政治跨越。这个跨越过程，不那么简单，也无法做到心身的绝对同步。身份认同，不是三年五载的事，二十年或许也嫌不够，它需要几代人完成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以一个“外乡人”的身份孤立于南洋的语境里。可回到中国合肥原乡探亲，又不知不觉暴露南洋人的特点和习性。心理上，身份的拔河比赛，好像还没有决出胜负。这样的纠结，不是一件糟糕事反倒好处不少，它磨练了我、也成全了我。

每次冬天回合肥，总会咳嗽感冒，老母亲就说：“那里一年热到头，你已经不适应合肥的冬天了。”想想也是。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叙述：“喝完酒步出庭院，烈日把（居銮）火车头街一带烤得滚热。天是蓝的，云彩则多变，店屋前一径飘着咖啡、拉茶、咖喱的香味，视觉嗅觉味觉贯通一气，这就是所谓的南洋了。我有时会抱怨南洋的天气，但转一想，若和风细雨、秋高气爽，那还叫南洋吗？”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则写道：“华美是一间老式海南咖啡馆，二楼临窗的位子看街景最适宜，有时突来一阵豪雨，天地转暗，脑子里回响刘文正的《雨中即景》——哗啦啦啦啦下雨了。南洋的雨来得快退得也快，雨过天晴，愈加湿闷，头顶上的吊扇似乎也力不从心，吱吱作响。”南洋自有南洋的天地、色彩和气味。

有些西方人翻译中国经典小说，非常好，可常常在一些不该失足的地方却“翻了船”，这是因为先天不足。我以新移民身份书写南洋，也是先天不足，加上“后天”更是有限，难免出纰漏、闹笑话，还望方家和读者谅解。

四十篇文章，涉及南洋的人物、文学、电影、音乐、书画和饮食。幸运的是，这些年结交了不少本地文化界的朋友，大家一起茶会餐聚，谈天说地，为我“契入”南洋，开了方便法门。

书里的文章大多刊发在《联合早报》“四方八面”专栏版和“名采”版，感谢这两个版的几任编辑，若没有《早报》的扶持和厚爱，我会少了写作的动力和干劲，这是大实话，绝非客套；书里也有几篇刊登在《源》杂志上，感谢谭瑞荣总编辑。

照例，我要感谢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（NAC）赞助本书的出版；感谢我的老板——潘国驹教授多年来的关照和信任；感谢责任编辑盛耿捷、美术编辑张伶、资深排版员李丽芳；我还要感谢婉欣帮我申请NAC的赞助。缺一环，这本书都无法面市。

2018年1月28日